

英国媒体与传播研究的马克思主义传统

批判与重构

曹书乐 著

Critique and Reconstruction:
British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Its Marxist Tradition



清华大学出版社

英国媒体与传播研究的马克思主义传统

批判与重构

曹书乐 著

Critique and Reconstruction:
British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its Marxist Tradition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京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侵权举报电话:010-62782989 1370112193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批判与重构:英国媒体与传播研究的马克思主义传统/曹书乐著.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

ISBN 978-7-302-33972-4

I. ①批… II. ①曹… III. ①传播媒介—研究—英国 ②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英国 IV. ①G219.561 ②B089.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27686号

责任编辑:纪海虹

封面设计:傅瑞学

责任校对:王荣静

责任印制:沈露

出版发行:清华大学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tup.com.cn>, <http://www.wqbook.com>

地 址: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A座 邮 编:100084

社总机:010-62770175 邮 购:010-62786544

投稿与读者服务:010-62776969, c-service@tup.tsinghua.edu.cn

质量反馈:010-62772015, zhiliang@tup.tsinghua.edu.cn

印刷者:三河市君旺印装厂

装订者:三河市新茂装订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160mm×230mm 印 张:16.5

字 数:202千字

版 次:2013年11月第1版

印 次:2013年1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45.00元

产品编号:043943-01

序

清华园里好读书

曹书乐博士的这部学位论文完稿之际，适逢清华百年校庆，也算献给母校的一份心意。

清华有所谓“三清团”的戏称，指学士、硕士、博士均出清华者。书乐即属此类“三清团”——本科为外语系（今外文系）英国语言文学专业、硕士为传播系传播学专业、博士为新闻与传播学院新闻传播学专业。此外，她还在中文系修读两年编辑学双学位，在新闻传播学博士后流动站从事两年研究，十五年的求学经历足以表明她的母校情缘，借用已故清华中文系主任徐葆耕教授的话说，“读于斯，长于斯，作于斯，婚于斯”……

我与书乐的交往，始于调入清华前的1999年。当时，应传播系负责人熊澄宇教授的邀请，为书乐这一届研究生上传播理论课程。这已是第二次来清华上这门课了。第一次是在清华人文学院的一间办公室，学生三五人，而这一次是在一间小教室，学生二十许。由于同上一届学生一道，为新华出版社翻译了一部专业书，学生之间声气相通，于是，一次课间休息时，有位端庄开朗的女生就问我：“老师，能不能也组织我们翻译一点东西呢？”她，就是曹书乐。于是，我同现任新华出版社副总编辑的挚友黄春峰联系，恰好他们刚谈妥一部新书的版权，我们一拍即合，遂有后来《白宫前沿——白宫记者团团长海伦·托马斯自传》一

书。而参与翻译的自然有书乐，另外还包括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青年教师的陈阳博士。也许受此影响，书乐后来陆续为清华大学出版社又译了一些专业书籍，特别是颇受嘉许的《大众传播理论：基础、争鸣与未来》（巴兰 & 戴维斯），而这些译著的责任编辑正是她的硕士同班同学纪海虹。

2001年调入清华，我与书乐交往自然更多了，如评阅硕士论文、参加论文答辩等。研究生毕业后，她先在北京电影学院任教，主讲传播理论课程，还兼任班主任，颇得老教师、新同学的认可。2005年，她与同属“三清团”的先生何威同时报考博士生，并双双录取，由此成为我的“开门弟子”。

记得入学后，聊起论文选题，她对“发展传播学”流露兴趣，希望在这方面做点研究。考虑书乐的优势——理论深厚、功底扎实、思想稳健等，以及清华的博士生定位——强调“顶天立地”、注重社会文化等，加之当时蒙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黄旦教授不弃，邀我参与教育部重点项目“传播思想史”并承担欧洲部分，我建议她考虑更有理论内涵，更富历史、文化、人文意味的欧洲学派研究，一方面可望在学术思想上有更大的贡献，一方面也更有利于中国自身的理论建设和传播实践。

不久，国家为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决定每年选派部分优秀学生留学欧美，入名校，从名师，而书乐与何威均获得首批遴选。由于郭镇之教授的推荐，书乐赴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传播与媒体研究所，师从批判传播研究的知名学者科林·斯巴克斯（Colin Sparks）教授。行前，我们几经讨论，学位论文选题大致确定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下的欧陆传播学派研究。书乐读博期间，曾担任范敬宜院长的助教，颇受老人家赏识。范院长生前着力推进的一项工作，是开展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教学科研，

他创建的“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研究中心”是学院两个校级中心之一，他还亲兼研究中心首任主任（现任主任为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郭庆光教授）。书乐的研究方向、论文选题以及学术关怀，自然也受益于范敬宜、斯巴克斯等马克思主义者的熏染与点化。

在英国一年半，她惜时如金，利用一切机会接触、了解、探询相关的学术渊源，穿梭于历史与现实之间，探求于理论与实践之际，偶尔接到她的邮件，谈的不是又参加了什么研讨会，就是又看到了什么资料文献，兴奋喜悦之情，每每溢于言表，万里之外也能感受她的“研学之乐”（丘成桐语）。

从2005年入学到2009年毕业，四个寒暑，几许汗水，最终凝结成这部博士学位论文。书乐由此获得学院优秀博士毕业生，2010年又获得北京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出版基金的资助。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其中酸甜苦辣，作者自己体味最深。我最难忘的，是论文答辩时的表现：陈述条分缕析，头头是道，答辩不卑不亢，有条有理。答辩委员会讨论答辩决议书时，按照“八股格式”准备写上“较好地回答了答辩委员会提出的问题”，听到这里，答辩委员会主席、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郑保卫说道：不是较好，而是很好。仅此一端，即知大概。那天博士答辩还有个镜头，给大家留下深刻的印象。她用课件打出马克思墓前那尊伟人头像，然后带出论文结论的点睛之笔——重要的不是解释世界而是改变世界。众所周知，这是马克思的箴言，也是他一生笔耕不辍、奋斗不止的目标。书乐的学位论文除了学术追求与思想建树，往大里说也在于让世界更遵从天理人心，让人类传播包括中国的传播事业更合乎人间正道，即所谓改变世界。

2010年秋季学期，我与史安斌教授继续主持研究生的“前沿讲座”

课程，此次我们决定稍微调整一下开课思路，除继续延请各路硕儒耆宿，还适当考虑学界新秀。这些青年才俊可能无法同专家权威相提并论，但思想之敏锐、眼界之开阔、观点之新颖又不能不令人刮目相看。于是，我们将三位博士后列入计划，而第一位登台的就是书乐。结果，不负所望，同样出色，纵横捭阖而条理清晰，内容厚重而讲解透辟。已入职北京师范大学的何威博士也前来旁听，并参与课堂讨论，侃侃而谈，举重若轻，要言不烦。当晚，数十位学子既感悟了学术新知，又领略了年轻学者的风范。本来，清华百年校庆前出版的拙著《清谭杂俎——新闻与社会的交响》，有篇《流水前波让后波——对我国传播学研究的回顾与瞩望》，末尾提到的“第四代”传播学者包括书乐，而她坚持划掉自己的名字。她说目前还不够格，希望将来能够做出名副其实的成绩。

书乐虽是我指导的第一位博士生，但她的进步与成长主要在于“三清团”的背景，以及范敬宜教授、尹鸿教授、郭镇之教授、斯巴斯克斯教授的熏陶。她的博士论文虽在选题、思路和主旨等方面受我影响，但达到如此水平却全靠她的勤勉与努力，用心与慧心。特别是，这项研究及成果立足国际学科前沿，既有开拓性，又有益于学术发展和社会进步，境界高，格局大，无愧清华。对此，我只能乐观其成，而难以置喙了。

书乐嘱我作序，我自感责无旁贷。想来想去，无从下笔，生怕狗尾续貂，只好讲讲书乐治学的故事，权当提供一点“新闻背景”吧。

是为序。

李彬

2011年马克思诞辰日于清华园

2013年修订

目 录

第一章 英国媒体与传播研究领域	001
第一节 为什么研究?	001
第二节 英国媒体与传播研究的疆域与流派	005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	017
第四节 本书思路与框架	021
第五节 相关文献综述	023
第六节 研究方法	032
第二章 英国左派知识分子与马克思主义	034
第一节 马克思在英国	035
第二节 英国共产党与左派读书俱乐部	041
第三节 新左翼知识分子的崛起	048
第四节 100年后:留下什么,哪些在改变?	060
第三章 英国文化研究:走近马克思主义 离开马克思 主义	064
第一节 英国文化研究的起源:文学传统与成人 教育	066

第二节	三大奠基人与马克思主义	072
第三节	什么是文化? 文化研究核心概念的嬗变	091
第四节	两次转向: 从文化主义到结构主义再到霸权理论	105
第五节	性别与种族进入研究视野	110
第六节	离开马克思主义	116
第七节	CCCS 的关闭风波	122
第四章	英国媒体研究: 以威斯敏斯特学派为代表	126
第一节	威斯敏斯特学派的形成	128
第二节	威斯敏斯特学派的基本立场与理论出发点	137
第三节	两位学派领头人	146
第四节	威斯敏斯特学派的多元研究领域与谱系	166
第五节	英国广播电视史研究	171
第六节	新受众研究	176
第五章	媒体政治经济学: 继承马克思	186
第一节	路径还是学派	186
第二节	继承马克思	189
第三节	路径建构与重要著作	191
第四节	三种叙述: 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脉络与地图	195

第一章	第五节 传播政治经济学中的马克思主义	201
	关键概念	
	第六节 马克思回来了	222
	结 论	224
	参考文献	230
	致 谢	249

第一章 英国媒体与传播研究领域

第一节 为什么研究？

传播学在中国早已过了而立之年¹。它自美国舶来，结合了中国的新闻学传统，并在最近十几年逐渐吸收欧陆与英国的各种人文学科及社会科学的养分，羽翼日渐丰满。在此过程中，中国传播学界从引进和译介西方经典著作、介绍西方理论开始，发展到出版本土理论著作和专题研究式论著，在接受西方理论的基础上进行了本土化改造和拓展。近期，学界更进一步强调问题意识与研究方法的规范性，呼吁研究与中国当下社会进程密切相关而紧迫（relavant and urgent）的议题，建构具有在地特点的传播理论。

1 2007年岁末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和深圳大学传播学院联合召开了“三十而立：中国传播学之未来”的圆桌会议，掀起了学界对学科建设历史进行回顾、对学科发展与未来进行讨论的浪潮。

近距离观察这一西学东渐的过程，不难发现，除了本土的新闻学传统外，传播学在中国的形成和起步阶段，主要受到来自美国的大众传播理论的影响。施拉姆在其奠基之作《男人、女人、讯息和媒介——理解人类》（1982）中建构了传播学的领域和研究问题，影响深远，遍及全球。该书两年后被译介到国内，取名为《传播学概论》（1984），自此开启了我们研究传播现象的大门。受此影响，国内学界将针对传播和媒体现象的研究统称为“传播学”，对应美国式研究“communication research”。早年的论述中不乏“欧美学者普遍认为”这样的全称式判断，这一称呼掩盖了欧洲与美国，以及欧洲各国之间的学术传统与现状的差异。

十数年来，在大众传播基础理论之外，以效果研究为主、重视量化研究和统计分析的美国式传播研究方法论，在中国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追随者，成为一股强劲的潮流。与此同时，随着中国传播学界的视野逐渐拓宽，欧洲及北美的批判传播学视角，英国的文化理论与媒体理论，德国的哲学与政治学思考，法国的符号学理论、意识形态理论及后现代传播思想，渐次成为我们新的思想来源。其中，英国学者在“文化研究”与“媒体政治经济学”两大领域的贡献得到强调，那些具有世界性声誉的知识界名家大师也为我们所知。但在现有引介中，尚未有一张清晰完整的英国学术地形图，不同学者、学说之间的互动与理论的发展脉络中，还有一些问题有待厘清。

当我有机会置身于英国学人之中，与知名教授和正在从事博士研究的年轻学者们展开广泛深入的交流时，发现——“英国似无传播学”¹。

1 笔者曾于2007—2009年间在英国媒体研究重镇威斯敏斯特大学访学一年半，本书的一些基本判断和事实性的陈述，来自笔者对英国学界的观察和与多位英国学人的交谈与访谈，以及对图书馆中大量早年文字资料的阅读。

这不仅是指英国学界普遍有意识地与“美国式大众传播研究”区别开来,而且还显示出英国学术界和知识界在认识论上的特点:他们宁愿把与传播和媒体相关的问题及现象看作一个值得研究的领域,让来自不同学科、不同知识背景的学者带着各自的问题设置(problematic)、理论视角和方法路径进入这个领域,开展研究;而不是急于将它建制化、学科化,建构出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和方法规范。正因如此,在英国自称“传播学者”的人较少,自称“媒体研究者”或“文化研究者”的人较多。也正因如此,英国关于媒体或传播的研究经常是跨学科的,其关怀也不止步于媒体与传播本身,而是触及民主政治公共福祉,或是探寻个人认同心理体验。当我们用习焉不察的“传播学”理论框架去寻找和审视英国的“传播学”时,难免会感到一种迷失——迷失在英国几十年来的各种具体研究中,无法一下就找到我们熟悉的研究模式和边界。

因此,有必要对英国的媒体与传播研究(而非“传播学”)进行一种梳理。一方面是因为在英国,在长期的学术研究和互动中,适于媒体与传播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渐渐被沉淀和传承,相关学术共同体慢慢变得相对固定,书写学术史成为可能。另一方面,国内的有关研究仍旧少见。复旦大学的杨击副教授(2006:4)曾以“英国的思想文化传统”为切入点,在其博士学位论文研究中对“作为一种整体的英国传播理论”进行了可贵的探索与论述,偏重于对某些重要学说的阐释与分析。而在广泛阅读文献和进行较为深入的实地考察后,我发现,还有一种切入点可以帮助我们 从学术史和思想史的角度把握英国有关媒体和传播的研究,这个切入点就是马克思主义。

可以说,从一开始,马克思主义学说就是英国学术界探寻媒体和传播领域的重要思想源流,并且被不同的学者所接受、修正、扬弃和再接

受。不论是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走近、继承还是走远，其动态变化都既反映了英国学术界的思想沿革演化，也反映出现实社会语境的流转变迁。对英国有关媒体和传播的研究来说，马克思主义学说并非其发展的逻辑和目标，也只是影响其发展轨迹的重要思潮之一。但在这个领域内，马克思主义学说可以成为我们分析和对比不同风格流派的学者之间异同的一种标尺，成为查探和书写学术史与思想史的一种参照，也是将学者们的理论、实践与物质世界、历史现实相互勾连的铆钉。

因此，我在本书中试图做出这样一种努力：既尝试从整体上把握英国学界关于媒体和传播的缤纷多元的研究，以书写学科史的方式对其进行勾勒；又努力以“马克思主义”为经络串起学科史上的史实，突出它对于学者本人以及研究本身的双重影响。当然，我也时时提醒自己，应当尊重历史事实，不夸大，不歪曲，不为论述而生造出本来不存在的关系。在这样的思路下，我的不成熟的发现或许可以增添一些有关此领域的新的理解。

鉴于本书的研究主体是英国学界的媒体与传播研究以及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影响，两者又均非可以一言以蔽之的简单概念或领域，因此下文将首先对英国围绕大众媒体而形成的学科领域进行界定，再对在英国知识界具有重要影响力的马克思主义进行辨析，作为之后进一步阐述的前提和基础。

另外需要补充说明两点。其一，因为本书是以马克思主义视角为切入点观照英国的媒体与传播学术史，所以将详述与马克思主义关系密切的学人和学说；与马克思主义关系不大的媒体与传播研究则在不影响学术史叙述完整性的前提下进行略写。为避免叙述上的详略失当，本书将在最后全面总结勾勒英国媒体与传播研究的学术地形图。

其二，英国的媒体和传播研究也存在着不容忽视的非马克思主义传统。¹ 例如，马克思主义作为对康德、黑格尔和费尔巴哈思想的批判继承，被普遍认为具有西方现代启蒙思想的本质特点。而文化研究的带头人霍尔曾多次提到其反黑格尔式的思想立场。再如，伯明翰学派到 20 世纪 80 年代出现了从葛兰西到福柯的思想转变。但以上情况均非对马克思主义的绝然否定，而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进行部分的扬弃、修正和更新，有关内容均在本书的讨论范围内。而那些影响英国媒体社会学界的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如涂尔干的思想、多元自由主义的思潮等，则不是本书的研究对象。

第二节 英国媒体与传播研究的疆域与流派

基本出发点

大卫·英格利斯在《英国的别具一格之处：联合王国的社会理论》一文中开篇写道：“在英国的背景下有关社会理论发展的任何讨论，都会遇到一个关键问题。是否存在一个独特的实体叫作‘英国社会理论’，足以与社会理论中其他所谓‘国族传统’相区分，自成一格？或者说，是否只是曾经在英国背景中不同时期产生过影响的许多社会思想潮流的混合，其中有些多少具有所谓‘本土性’，而大多数则根本没有？”（引自德朗蒂，2009：107）

我想借用他的这番话，来说明我在看待英国媒体与传播研究的传统

1 此处感谢郭大为博士提醒我进行必要的解释说明。

和发展时的一个基本出发点。那就是，必须在大众媒体开始对英国社会现实产生影响之后，针对知识界对这种影响的反应进行一个历史性的考察，考察过程要结合在此前和在此期间进入英国的不同思潮；在考虑到英国知识分子的特性的基础上，以开放的思路观照英国的媒体研究及与欧洲其他国家乃至美国的联系和区别。也就是说，我并不认为有一种独立发展、自成一体、完全区别于其他国族传统的“英国媒体与传播研究”。毋宁说——在英国的国界之内，在特定的历史文化政治经济条件之下，以媒体与文化为对象的研究形成了这样一些思路与学说，其中一些是英国特有的，另一些则是在与他国学者的交流中发展起来，或者从英国播散开去的。

另外一个基本出发点是，要认识到，在英国的学术语境中，对媒体或传播的学科意识其实较为淡薄。¹正如狭义的英国文化研究在诞生之初就是一种反学科的知识实践并且保持了反建制的特点一样，狭义的媒体研究同样如此。文化研究曾为当时的社会学和英国文学批评所不容，媒体研究则在英国教育制度发生转型之后才在新兴的技术工艺学校中涌现。随着媒体在社会中影响力的日益壮大，它们也在传统学科不屑的目光中蓬勃发展，但本身并不急于竖起学科的高墙。它们对文化 / 媒体 / 传播的有关研究，更确切地来说是以文化或媒体或传播为关注对象的一个问题域（site of inquiry）。而从事这些研究的学者本身，大多认为自己的工作更倾向于知识分子的工作（intellectual work）而非仅仅是学术研究（academic work）²，将对文化与媒体的研究与批判实践结合在一起，能够实现其有机知识分子（organic intellectual）的政治抱负。既

1 此处论述受益于与章戈浩博士的讨论。

2 较有代表性的参见霍尔的自述（Morley & Chen, 1996: 274）。

然如此,我将尽量在本书中诚实地呈现这一点。

命名:媒体研究与传播研究之辨

那么对于这一领域的研究该如何命名?英国学者们常在著述的标题或行文中将之笼统地称为“媒体与文化研究”或“媒体与传播研究”。当翻开一些在英国最知名的编著或教材,会看到诸如此类的标题:《媒体、文化与社会》(Collins et al., 1986)、《媒体与权力》(Scannell et al., 1992)、《文化、社会与媒体》(Gurevitch et al., 1982),等等。这些貌似彼此重复的标题无疑在说明,“媒体”是研究的核心,对“媒体”的研究离不开对它与“文化”、“社会”的关系的研究,而“权力”是研究的着力点之一。至于“传播”,则更代表美国大众传播社会学跨洋而来的影响力。

如要以英国学者的视角来看待“媒体研究”与“传播研究”的差异,或“媒体”与“传播”的差异,我们首先要明确如下学术史事实。20世纪30年代中期至50年代中期,在美国逐渐形成了大众传播社会学(Scannell, 2007: 1)¹。而英国,虽然文化研究的先驱者在50年代开始就已发表关于媒体的重要论述,但60年代末至70年代末才是文化研究发展的“关键十年”(Scannell, 2007: 199)。“二战”后,新兴媒体——电视对英国社会产生了较大影响,文化研究的学者们也将研究焦点集中在电视上。正是从60年代到70年代,在英国,媒体研究成为文化研究的分支(Scannell, 2007: 1)。80年代以后,从文化研究中分

1 “大众传播社会学”的说法可见帕迪·斯堪内尔(Paddy Scannell)的表述: mass communication sociology。早期美国从事传播研究的学者主要来自社会学学科背景,以新兴的传播现象为研究对象。英国学者因而有此一说。斯堪内尔教授长期在英国从事媒体研究与教学,主讲媒体与传播的基础理论;退休后受聘美国密歇根大学。他对大西洋两岸的研究都颇为熟稔,近年在对英美的比较中撰写理论史著作。